

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,考生们开始进入一段特殊的时期——“后高考时代”。等待出成绩、等待录取的过程中,兴奋、失落、期待、焦虑……种种复杂的心情伴随着考生和家长。人生中这段特殊时期该怎样度过?在此,希望几位中老年朋友分享的亲身经历,会给大家带来启迪。——编者

难忘的“后高考时代”

未来可期

彭哲

“未来可期”,40多年前,我秉承着这句话,走过了高考放榜前的“真空期”,并挺过了落榜后的那段痛苦日子。

1977年恢复高考时,我正在太原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木工学徒。虽说我是高中毕业,但当年高中时期未能坚持学习,且又毕业多年,只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了考场。

两天的考试结束了,我预感自己发挥不好,被录取的希望不大,估计还得干几年学徒工,还得应对学徒期满的考核。于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,我就硬着头皮到工地上班了。

见了工友,我没吭气,只是一门心思干活,以转移自己和别人的注意力。工友见我脸色颓丧,有关心的,有劝导的,当然也有说凉话的。我心里还有一丝希望没有破灭,整日里焦急地等待着放榜的时刻。

白天上班工作累,心里倒是也顾不上乱想,可是晚上下班回到家里,心中的焦虑却又让我茶饭不思,坐卧不安,幻想着那高考录取通知书,想着那大学校园的大门,还有那窗明几净的教室……家里人看我整夜整夜地辗转难眠,长吁短叹,知道我的心事,于是鼓励我:“与其焦虑万分,倒不如再拿起课本来看看,争取明年再考。”我一想,的确如此。于是晚上下班后,略微休息,便继续拿出课本复习。就这样,我白天上班,晚上复习功课,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二十几天的“真空期”很快就过去了,我最终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,但我已经有了良好的心理准备,所以没有感觉到我的世界有多大的灰暗。

第二年可以报考中专,我主动降低了目标,考上了太原师范学校。之后,我又不懈地复习、考试,终于考上了成人大专,圆了我的大学梦,做了一名中学教师,后又跻身于机关单位。那些年,是“未来可期”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的精神,为我激发前行的力量。

快乐时光

胡春燕

1982年7月,三天的高考结束了,那个假期便成了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候。

十年寒窗,终于可以放下紧绷的弦儿放松心情了,那年我16岁,和所有青春年少的同学一样,沉浸在玩乐中,书包扔一边再也不想翻一下书本。我可以光明正大问我妈要钱,约同学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,买平时买不起的杂志《大众电影》。那时我在学校算不上好学生,家长对我的要求似乎也没有那么高。那一年我们高考升学率大概只有17%,所以我心里也早已经是“一颗红心两手准备”了。

那个夏天,我在家最喜欢的是收听电影录音剪辑,我和同学陈燕疯狂地喜爱上配音演员,诸如刘广宁、李梓、乔榛、童自荣、毕克等,太多太多的配音的电影将我带到另一个美妙的世界,那磁性的充满感情的配音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,回味无穷。

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还去妈妈所在的印刷厂小集体干了些许日子。做计件工人很苦,永远完不成任务,即使姐姐常来偷偷帮我,我也是完不成。但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装订、折页、刮板数纸、包装等程序,熟悉了印刷厂的流程,知道了无论什么工作都有不容易的地方。

很快,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,成绩出来,我没有考上大学,只考上技校,但那个专业还是我极不喜欢的,我纠结去不去报到。矛盾中,妈妈给我找了一个化工系统的指标,我于是毅然去报到上班了。先在小集体工作,同年10月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工厂,成为一名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。

三上考场

阿峰

1980年3月,高考前最后一学期,我们太原六中让同学们选读文科还是理科。父亲说:“国家要建设现代化,理科应用更广,上理科吧。”我虽偏于文科,还是听了父亲的话。结果考砸了,数理化没一门上60分,铁定上不成大学。我心情十分沮丧,唉声叹气,愁眉苦脸。那时招生叫“一条龙”:本科、专科、中专、技工,从高到低录取,最终我的分数只够上技校。

父母看见我难受,便让我姐、我妹陪我去临汾散散心。大伯和伯母接待了我们仨。叔伯兄弟姐妹带我们去看鼓楼、逛尧庙、瞻仰铁佛。转悠与说笑之间,使我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。大伯还单独带我去人民公园谈心。曾经为志愿军做手术荣立战功的大伯对我说:“1948年,你父亲到临汾上初中,敌机来轰炸,有的同学跑回家里去,你爸没回洪洞县咱村子里,而是坚持上学。那该有多危险,各方

面也艰苦。现在条件好,你想去补习,去就行了。你这么年轻,没啥可怕的,大不了再来一次。”几句话让我心情有所好转,可我还是嘟囔道:“就是感觉丢人。预选成绩不错,父母寄予希望,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可以,谁知道就考成这样?”大伯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考试不太如意,这不丢人。孔子周游列国有多少难?司马迁有多难才写成《史记》?遇到点挫折不算啥,大不了重来。”我点点头,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心回到太原。

1981年7月,我第二次参加高考。预选时70名同学中,我成绩第一。然而,正式上考场又考砸了,分数仅够上中专。走不走?我在痛苦中犹豫起来。不想总在家吃了睡、睡了吃,我向父母要几块钱,骑自行车去远一点的地方。这次去崛围山观山景、看壁画,下次去晋阳湖欣赏湖水荡漾、湖面夕照,在湖光山色中忘却烦恼。再想一想,母亲在50年代

就考上山西师范学院体育科(山西大学体育系前身),我80年代反而考不上个大学?不甘心呀。于是,9月份便去18中文科班补习了。

1982年6月,过度劳累使我得了急性黄疸肝炎,住进二六四医院。出院后第三次上了考场。这次考完,我没有太多压力,已想好不管考上什么都去上。结果,本科录取线是390分,我考了381,拿到太原师专的录取通知书。开学前,我在迎泽公园约会了已通信两年多的初中同学小芸。早在我第一次补习时,她已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。她给我来信称赞我不服输的拼搏精神,并托人送我一本外语复习资料,鼓励我保持信心。我发誓考不上大学就不与她见面。这下终于可以见面了。我们畅谈着个人理想,在表达爱情中也加入了不负青春的决心。当夕阳映照在迎泽湖面上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。

翻过这座山

米玲

1981年夏天,在太原第27中高二农医班(相当于快班)毕业前夕,我预选合格,得到了高考指标。

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生特别多,因此要求提前进行预选,领到预选合格证的同学才能参加高考。同学们当中,预选合格者寥寥无几。当时高考招生规模小,大专院校少,而参加高考的人数特别多,有人形容高考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。

高考进入了倒计时冲刺阶段,妈妈心疼我每天开夜车备战高考,当我取得了“预选合格证”后,她买回三瓶罐头,告诉我,在高考的那三天,可以一天吃一瓶罐头。

我和同学们是在太原六中参加高考的。记得高考那几天,就像是平时在学校参加劳动,家长用“猪腰饭盒”给我带好午餐,要说特殊待遇,便是享用一瓶甜爽冰凉消暑的罐头。

当时小学实行5年制,初中3年制,高中2年制。我5岁半上小学,在不到16岁时,我已经高中毕业,并参加完高考。

接下来,是预估分数、填报志愿,由考生按照估分“一条龙”填报,要求大学、中专、技校,同时填报。自己感觉是考场“败将”,所以并没有认真填报,最终名落孙山。

经过争分夺秒冲刺高考,又经历了落榜的打击,结束战斗后显得身心疲惫。见我整天无所事事,空虚无聊,不和任何人交流,邻居静萍阿姨不敢问我考试成绩,只是把她家钥匙给我,让我去她家看电视,去看我喜欢的节目《follow me(跟我学)》,她鼓励我继续努力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母亲单位招收一批“小集体”知青队员。许多同学报名参加工作,我非常羡慕他们走向社会,自食其力,还能挣钱补贴家用,便毅然决然地

要报名上班。就这样,16岁的我收藏好预选合格证,参加了工作。为了继续看电视,学习《follow me(跟我学)》,我主动要求到锅炉房拉平车、烧锅炉,虽然这种活计又脏又累,但我可以利用三班倒的时间学习。第二年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山西电机技校,学习机械制造专业。

我的高考不知不觉已过去41年了,岁月苍老了我们的容颜,冲淡了我们的人生坎坷。回想人生历程,我虽然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,但在参加工作以后参加了成人高考,通过不断努力,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。

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进行时,不是完成时。我想说,对于高考,你只需要怀着努力的心态完成这场考试。无论高考成绩怎样,都不影响你翻过这座山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,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上。

与孩子共度特殊时期

李汝骠

高考过后,录取之前,确实是一段特殊的时期。我的三个子女先后经历了高考,度过了这样的一段日子:苦涩、焦虑、等待、期盼、兴奋,五味杂陈。

大儿子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,考后估分成绩不理想,孩子情绪不佳,内心愧疚。我对孩子语重心长地说:“今日的失利,都由于过去的不够努力;今日的努力,必换来将来的大丰收。只要你愿意,咱们可以再补习一年。”为了转移孩子的情绪,我对他说:“学校给咱家分配了一套三居室新楼房,离咱现在的家不远。”大儿子立刻转忧为喜说:“我找上几个好朋友,帮咱们搬家吧!”劳动的汗水稀释了大儿子的懊悔与痛苦。高考成绩揭晓了,大儿子录取到太原师专。他记住了我说过的话,后来他自学了本科课程,又考上了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,40岁时,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,如今已成为一名学者型的大学老师。

1983年女儿高考结束,考得不错,但在两所北京重点大学与专业间纠结着。

女儿很有主意,她一边思考一边对母亲说:“我们拆洗被褥吧!”女儿帮助母亲把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。女儿又问我:“心理学是什么专业?”我尽自己所知,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学专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,大儿子也介绍了有关情况。女儿听得十分专注,最终在太原考生中只有她一人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录取。后来又读了博士,做完博士后,被电子科技大学留校,如今已是心理学专家教授了。

1988年小儿子参加了高考,高考以后就是估分环节。当时填报志愿是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。经过三次估分再加以平均,得出最后估分,作为填报志愿的依据。成绩比较理想,全家人都很高兴。志愿有两个选项:一是北京大学数学系;二是北京交通大学无线通讯工程系。最后我把选择权交给了小儿子,他经过两

天的考虑,最后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后者,然后就参加了勤工俭学劳动,为自己挣上学费用。如今小儿子在华为任高级工程师。

回忆三个孩子高考以后度过的特殊时光,当时的家庭条件不可能让他们出门旅游、聚餐、疯玩,只能是进行自我总结和选择,只能是让他们通过参加劳动得到生活的历练,从而较好地规划了未来的发展蓝图,走上了健康成长之路。

